

第二章 徐润买办生涯和早期商业活动

第一节 香山地域对早年徐润的影响

地处广东南部的珠江三角洲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早在16世纪葡萄牙就人居澳门，西方传教士也伴随而来。西方经济文化东渐使这里的人们很早就接受西方的新事物、新思想和新文化，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南部的香山，由于紧邻澳门、香港，最早得风气之先。葡萄牙人居澳门，中国开始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这种挑战从大西洋，经印度洋，直面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文化早熟，因此面对西方异质文明的挑战，香山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都在发生着与内地有着很大不同的变化，并逐步开放。正是风气初开的香山对早年徐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促使15岁的徐润在咸丰二年（1852）离开自己的家乡前往上海，开始新的生活。

鸦片战争后，地处广东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前沿，也是最早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广州、虎门、香港等地在鸦片战争中曾是中英双方交战的重要战场；鸦片战争结束后，也是中国主权破坏最早的地区，割让香港，领海主权、关税权、司法权等的破坏，外国商品的输入，教会势力的渗透，珠江三角洲地区首当其冲。五口开放后，清朝的闭关政策从此解体，广州成为

唯一通商口岸，由“十三行”^①垄断贸易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产生了一批为外国资本家经销棉毛织品、鸦片等进口商货和收购丝、茶等出口商货的新的商人，即中国近代的买办商人。怡和洋行^②的唐廷枢^③、唐廷植^④，宝顺洋行^⑤的徐润，汇丰洋行^⑥的唐翘卿^⑦，太古洋行^⑧的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⑨，旗昌洋行^⑩的吴健彰^⑪均出生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买办商人在与外国资本家

① “十三行”又称公行，是清闭关政策的产物，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中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进出口贸易由公行经管，公行通称“十三行”，其实并非十三家，多达二十六家，少则四家，在清对外关系中起着特殊作用。

② 怡和洋行：英文为 Jardine, Matheson & Co., 1832年7月1日，查甸（W. Jardine）与马地臣（J. Matheson）接办马尼亚克公司，改名为查甸·马地臣公司，即怡和洋行，被人称为“洋行之王”。怡和洋行积极开展对华贸易，特别是鸦片走私贸易，1842年公司总行由澳门迁往香港，首任经理为达拉斯（A. G. Dallas），从此，公司在华业务不断扩大；开展进出口贸易、航运、金融、保险、房地产、加工制造等，在汉口、天津等十多处大城市设分支机构，成为在华外资企业中最大的企业集团。

③ 唐廷枢：1832年出生于香山唐家村，卒于1892年，怡和洋行买办，中国近代著名的企业家和洋务派官员。

④ 唐廷植：1828年出生于香山唐家村，卒于1897年，唐廷枢胞兄，怡和洋行买办，中国近代著名的企业家和洋务派官员。

⑤ 宝顺洋行：英文为 Dent, Beale & Co., 1807年葡萄牙人达卫森（W. S. Davidson）在广州开设达卫森公司（Davidson & Co.）。1823年，颠地（T. Dent）接办该公司，并改组为颠地公司（Dent & Co.）。宝顺洋行猖狂从事鸦片走私活动，还从事丝、茶和印度棉花贸易。1839年，颠地被林则徐处罚。1843年颠地到上海，创立颠地·比里公司（Dent, Beale & Co.），即宝顺洋行，公司第一任大班是英国人比里（T. C. Beale），1857年由韦伯（E. Weber）接任。公司在华开展丝、茶、棉、鸦片、航运及进出口贸易，在烟台、天津、牛庄、镇江、芜湖、九江、汉口等地建立分支机构，盛极一时。1867年因经营不善而停业。

⑥ 汇丰洋行：英文名为 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 Ltd. 1865年4月3日，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同时成立并开业。该行由大英轮船公司的香港监督汤麦斯·苏石兰发起筹建，第一任经理为法国人，后由英商全权掌握。该行大力经营国际汇兑，积极扶植在华外国企业，在华发行大量纸币，向华商进行抵押放贷。1895年后向清政府大量贷款，并在福州、宁波、汉口、汕头等地设立分支机构。

⑦ 唐翘卿（1841—1925）：香山唐家村人，唐廷枢族侄，近代著名茶商，汇丰洋行买办。

⑧ 太古洋行：英文为 Butterfield & Swire Co., 1866年11月由英商斯杯尔（Swire）在上海建立。1867年1月1日，建立公司，1872年成立太古轮船公司，先后在香港、广州、天津、牛庄及日本神户、横滨建立分支机构。

⑨ 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莫仕扬（1820—1879），香山金鼎会同村人，太古洋行第一任买办；莫藻泉（1857—1917），莫仕扬次子，太古洋行第二代买办；莫干生，莫藻泉子，太古洋行第三代买办。

⑩ 旗昌洋行：英文为 Russell & Co., 早期的美国商行。1803年美国军官柏坚士在广州创办，1818年转让给美国商人沙墨尔·罗塞尔（Samuel Russell），俗称“老旗昌”，1824年改为罗塞尔公司，即“旗昌洋行”。旗昌洋行在华开展丝、茶、鸦片贸易，1846年在上海开设分行。1850在香港设立分行，业务扩展到保险、贸易、航运和工业生产。1891年自行停止在华的一切活动。

⑪ 吴健彰（1815—1870），关于他的出生一说是广东潮州人，一说是广东中山人；旗昌洋行买办，能讲外语，为外国商人器重，集资巨万，也为清廷器重，曾任上海道。

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知识、管理技术，学习西方的语言，了解西方的历史地理，成为晚清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中国人。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由于自身经济利益的局限，他们还不可能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①的境界，直到19世纪60年代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才发展成为具有封建性、买办性和民族性的洋务派。

香山，珠江三角洲南部的小港湾，原本是一个很荒僻的地方，这里的乡民始终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②的贫苦生活。但自澳门开埠后，这里得风气之先，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都在不断变化。

一、经济结构开始变化

从明朝末年年开始，香山人就开始冲破单一的农业生产向经贸方面发展。清朝乾隆至道光年间，“广州十三行”的贸易活动日趋活跃，澳门更是“商贾云集”^③，香山处于澳门与广州之间，占有地理位置的优越，这里的人们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国际上的新鲜事物，于是有一部分人不再种田而外出经商贩运。《子英房谱》记载广礼房^④的十六世祖士功“赴琼南种植槟榔，获利甚丰。”^⑤广礼房唐逸才道光末年（1850）“客港澳经商，家称小康，获翠微吴建章观察代捐中议大夫恩赐修职佐郎（九品）。 ”^⑥广礼房唐棣华“少有远志，道光中，挟资本营业硃洲，创合隆杂货店，往来梅录之间，囊篋充盈。”^⑦可见香山人早在17世纪就因地理位置的优越，视野渐开，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开始改变，单一的传统农业经济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冲击。香山人开始往来于港澳、海南、内地经商贩运，且获利较丰。到鸦片战争前夕，这种势头更猛，开始出现了积蓄丰厚的富商巨贾，经营范围也由港澳扩展到内地福建、上海、汉口、广州。道光七年（1827）梁尚举撰写的《重修三（间）庙碑文》记载：“唯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重修后，风俗敦庞，人心厚懿，士气腾茂，农谷丰登，商贾往来之繁，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议战》，岳麓书社，1998年版。

② 《香山县乡土志》，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版，第21页。

③ 唐步瀛：《子英房谱》，民国廿三年申戌春，第7页，现为私人珍藏。

④ 唐姓，南宋宁宗皇帝年间自南雄南迁，经二世、三世、四世，至五世子英公居唐家，生六子，长广礼，次广达，五广通，六广润，余二房无嗣，广礼房为长房。

⑤ 前揭《子英房谱》，第8页。

⑥ 前揭《子英房谱》，第8页。

⑦ 前揭《子英房谱》，第8页。

鱼盐居积之富，迨有过之而无不及。”^① 随着外出经商的活动频繁，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农产品、手工业产品成为商品的速度加快，这不仅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也加速商贸往来的频繁。特别是在进行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富商巨贾，他们除了捐献乡里，乐善好施外，还积极参加近代经济建设，积极创办民族工业。

二、香山人外出闯世界

随着单一农业经济的突破、商贸的频繁，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维方式开始发生变化，香山人开始离开家乡，到国内的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到港澳、东南亚，到美洲去开辟新的事业。这不仅仅是简单地背井离乡，也不仅仅是简单地“漂洋过海”，而是在新事物、新经济影响下人们思想的一次解放。

咸丰五年（1855）香山人唐步瀛写的《金山埠记》载：“道光二十八年（1848），有花旗夷人载货趁诸国，中途遇风漂至一山，杳不识其名，偶登彼汲水，“见坑边毫光闪烁”与砂砾杂处，夷人诧曰：此黄金也……到山开埠即金山……由是传播中华……”^② 这实际上就是记载旧金山发现黄金的过程及旧金山开埠和对中国的影响。美国旧金山发现黄金后，许多已经有一定商品思想的中国人都加入到美国的“淘金热”中。

道光二十九年（1849），有侄由上海回家，告余曰，欲往金山，……遂于四月与数人同往……果有大获。由香港扬帆一路向东，过日本国后，由东转北，海天瀕洞，上下一色，七十余日到埠……。廿九三十年间，掘金多为夷人，唐人（香山唐家人）仅数百人……。咸丰六年（1851），唐人源源而来，即如我都，大乡六七百人，小乡二三百人，他如外县外府更难仆数。^③

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美国旧金山发现金矿到咸丰六年，香山唐家村由数人到数百人，到大乡六七百人，小乡二三百人去美国旧金山开矿，说明漂洋过海开发新的事业不只是少数人的行动，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群众的自发活动，在这种自发的劳力输出中，香山县特别是毗邻澳门前沿的唐家、北岭则走在中国的前沿。徐润的父亲徐宝亭中年时就在澳门与省垣间摆渡船，对中外交涉更进一步了

① 碑文保存于珠海市唐家三间庙圣堂庙。

② 唐步瀛：《金山埠记》，载《子英房谱》，第10页。

③ 前揭《子英房谱》，第10页。

解。“吾中年设渡船来往澳门省垣间。”^① 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年轻时就开始在澳门从事中外贸易，并认识英国人必里士^② (T. C. Beale)。“初游澳门，察外国货之来售于中国者，握奇计、赢积资已隆隆起。”^③ 在这些人中，有的“大行其志，则业丰盈，乃纳粟得官”^④；有的“获利大丰”，捐献乡里；有的则定居“金山”，成为华侨，这些人经济地位的变化对文化教育的要求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对自己子女教育的要求与期望值也就发生了变化。

三、北岭村人教育观念的变化

徐润的家乡北岭村自澳门开埠以来，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在从事商贸的经济活动中产生了一批富商大贾，他们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敢于远离家乡，远离祖国出外闯世界。在经济活动和行为方式变化的过程中，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北岭村人能朴素地接受西方的先进事物，特别是教育方式的变化更突出。经商成为殷商富户的“北岭村人”纷纷送子弟们出洋留学或者去大城市的“洋学堂”读书；“淘金”暴发者，更加有意栽培他们的子弟。贫寒之家也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培养自己的子弟。徐润同乡香山南屏人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这样叙述：“予生于彼多罗岛 (Pedro Island) 之南屏镇。镇距澳门西南可四英里。”^⑤ “一八三四年，伦敦妇女会议在远东倡女学，英教士古特拉富之夫人 (Mrs. Gutzaff) 遂于是时莅澳，初设一塾，传授女生。未几复设附塾，兼收男生。其司事某君，予同里而父执也，常为予父母道古夫人设塾授徒事。”^⑥ 由于容闳出生地距离澳门很近，只有“四英里”，所以澳门的变化很快能影响到他家乡。英国教士在澳门办学这一消息就自然而然地传到澳门附近的香山南屏镇。特别是当时许多中国人已经在澳门、香港从事行业不同的工作。容闳父亲的朋友，唐廷枢的父亲唐宝臣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在港澳看到商贾云集，商业繁荣，统治秩序井然，知识的重要，社会的进步，于是萌发让自己的儿子或朋友的儿子入西式学校学习。“意者通商之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

① 前揭《北岭徐氏宗谱》卷7，北岭肇修堂印，第69页，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和珠海博物馆。

② 必里士即必里氏 (T. C. Beale)，宝顺洋行大股东。《徐愚斋自叙年谱》中称必里氏；《北岭徐氏宗谱》卷7，《先德录》，北岭肇修堂印，第64页，称必里士。

③ 前揭《北岭徐氏宗谱》卷7，《先德录》，《诰授中议大夫、盐运使銜、候选道徐君德球行状》，第64页。

④ 唐步瀛：《广礼房谱》，民国廿三年申戌春初，私人珍藏。

⑤ 前揭《西学东渐记》，第67页。

⑥ 前揭《西学东渐记》，第67页。

人使，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① 容闳的父母让容闳入读英国教会学校，是希望儿子学到西方的知识后能成为一名翻译或洋务委员，唐廷枢的父亲也只是想让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成为英国人手下的一个仆人。唐廷枢、容闳就是这样走出自己的家乡接受西式教育的。徐润则走了一条与容闳、唐廷枢不同的外出和求学之路。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叔父徐荣村很早就离开自己家乡北岭村前往上海闯世界，均为宝顺洋行著名买办。1852年，十五岁的徐润由其叔徐荣村从家乡途经澳门带往上海求学，先赴苏州扬子芳家读书，苦于言语隔阂，“不惟书不能读，话亦不明，于是仍回上海。”^② 乃由其伯父徐钰亭引荐，到宝顺洋行当学徒，开始其艰难的边学艺边自学文化知识的工作学习之路，而且在此工作了十六年，这是徐润一生事业积累和沉淀的十六年。

四、香山人才群体的出现

香山特别其所辖的现珠海地区，自澳门开埠后，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最早得风气之先，接受西方先进的事物。经济结构由单一农业向经贸发展，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都在不断地变化。于是香山人有的漂洋过海，有的到澳港、东南亚，有的到广州、上海、汉口等国内大城市闯世界开辟自己新的事业。这批人经济地位的变化和接受新事物后思维方式的变化，对子弟们读书学习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他们要求有优质的和与西方接轨的近代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能适应走向近代化的中国的需要，于是以现在珠海市辖区为中心的香山县近代化人才群体就形成了。

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签订、五口通商、沿海大小港口开放，外商纷至沓来寻找商机。他们需要代理人“架桥铺路”。于是“买办阶层”就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和环境中产生，而最早开风气之先的香山一个买办实业群体应运而生，有的甚至成为买办世家。唐廷枢、唐廷植、唐纪常、唐杰臣兄弟叔侄三代四人担任怡和洋行买办长达五十年；莫仕杨、莫藻泉、莫干生祖孙三代连任太古洋行买办长达六十年；徐昭珩、徐瑞珩、徐润叔侄三人连任宝顺洋行买办长达三十六年；唐瑞芝、唐朗山兄弟任汉口俄商埠昌洋行买办长达三十年。此外，还有宝顺洋行买办盛恒山、上海汇丰银行买办唐翘卿、英商香港渣打银行总买办容配锦、美国旗昌洋行买办吴建彰等。香山为整个晚清的买办阶级输送了大批的骨干力量，徐润就是买办群体中一个重要代表。

^① 前揭《西学东渐记》，第67页。

^②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页。